

曾纪泽的国际法认识与实践初论*

赵杰宏

(常熟理工学院 社科部 江苏 常熟 215500)

摘 要 :中国早期驻外公使之一的曾纪泽通过对近代国际法的深刻认识与理解 ,运用国际法与西方国家进行外交事务上的交涉和谈判 ,虽然在本质上不能改变晚清政府外交上的弱势地位 ,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权益。

关键词 :曾纪泽 ;国际法 ;认识 ;实践

中图分类号 :D99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 509X(2005)02 - 0026 - 03

国际法 ,旧称万国公法 ,主要是国家之间的法 ,它主要是在各国交往中通过协议或认可形成的、协调各国意志的、有国家单独或集体的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体^{〔1〕}。作为近代西方国家处理相互之间外交关系的重要准则和规范国际社会关系和国际行为的重要机制之一 ,受到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社会的普遍重视。我国早期驻外公使之一的曾纪泽通过对近代国际法的深刻认识与理解 ,运用国际法与西方国家进行外交事务上的交涉和谈判 ,虽然在本质上不能改变晚清政府外交上的弱势地位 ,但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权益 ,同时也为中国近代外交官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对中国外交的近代化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本文仅就曾纪泽对国际法的认识及运用等问题作一探讨。

一、曾纪泽的国际法认识

曾纪泽(1839—1890),字劭刚,湖南湘乡人,曾国藩的长子。从光绪四年至光绪十一年(1878年至1885年),曾纪泽作为晚清政府的外交官员,奉命出使英、法、俄等国。在这期间,他恪守保全国家大局的信条,极力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不折不扣,与列强唇枪舌剑,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做斗争。他是近代第一批有机会亲身观察和了解19世纪国际社会的中国人,也是晚清时代最早对国际法有切身体验的一批人中的一人。

曾纪泽对国际法的关注更多是由当时的国内外政治环境以及个人的职责所决定的。作为驻外公使,曾纪泽的职责决定了他要与西方列强直接打交道,同时他的一言一行关系到国家的尊严和名声,这些迫使他更多地观察世界时势,学习和应用国际法,“师夷长技以制夷”。对于这一点,曾纪泽已予以清醒地认识,他认为中西通商,交往频繁,开创了“千古未曾之局”^{〔2〕},是时势使然,完全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对今天早已变化了的世界格局,中国“不能闭门而不纳,束手不问”^{〔2〕},只有正视现实,顺应时势,“贵能易地而思之”^{〔2〕}。在获悉清政府将派他出任使节后,曾纪泽充分地利用各种途径,拓展知识领域,了解西方情形,他阅读了好多关于国际法方面的书籍。在得知正式任命他出任英国、法国钦差大臣,曾纪泽意识到自己作为一名驻外公使必须了解和熟悉国际法中有关驻外使节的条文准则,因此他又重读了《出使章程》、《条约类编》、《国使指南》、《公法便览》等书以便迅速掌握和熟悉中英、中法情况。曾纪泽与近代中国输入国际法关键人物丁韪良的关系很是亲密,据日记记载说:“光绪丁丑秋,承袭统封来京觐谢,侨寓京城东南,与秦西清清朝聘之馆舍比邻,于是英国汗文正使梅君辉立,偕副使璧君利南闻声见访,纵谈竟日。而债学之士英国艾君约瑟、德君约翰,美国丁君韪良,亦先后得订交焉。”^{〔2〕}曾纪泽出使前的一段日

* 收稿日期 2005 - 04 - 20
作者简介 :赵杰宏(1978 -),男,江苏淮阴人,常熟理工学院教师,国际法硕士生,研究方向 法律理论。
万方数据

记中时间上多次提到了丁甦良,大多数是记载了二人的相互访晤交谈的事情,是曾纪泽当时接触最为频繁的一个。尽管不能得知二人交谈的内容,但国际法无疑是二者交谈的主要话题之一。

在光绪五年(1879年),曾纪泽就对外交豁免权和最惠国待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根据公法所载“公使所离其本国辖境,不归主国地方官管理,馆内人役,亦不受主国官衙约束,有在外犯法者,询属本国人,即交其国公使询治,主国不侵其权。然必确系寓居使馆,派有职事之人乃然,所谓公使应崇之权利也。”^{③③ p.164-165}至于最惠国待遇,他分析道:“中国与各国立约,所急欲删改者,惟‘一国倘有利益之事,各国一体均沾’之语最不合西洋公法。缘有时乙国以事求于甲国而蒙允许,丙国亦欲同沾利益,其实,交际情形并不相同,无益于两国而徒有损于甲国也。”^{③④ p.199}曾纪泽在驻使期间也注意同西方的法律界人士交往,虚心学习西方的法律知识:“万国公法会友士爱师来,谈极久。言东方诸国未入公法会,中人深愿中国首先倡导云云。”^{③⑤ p.225}随着中外交往的增多,曾纪泽逐渐认识到国际法更多的外交作用,他说:“西洋各国,以公法自相维持,保全小国附庸,俾皆有自主权,此息兵安民最善之法。”^{③⑥ p.225}

二、曾纪泽在行动上对国际法的实践

基于对国际法认识的逐渐深化,曾纪泽在驻使英、法、俄国期间,逐步学会了运用国际法这一新式武器与西方列强展开多方面的外交斗争,在晚清外交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乌石山教案,是曾纪泽出使欧洲后利用国际惯例处理交涉事件的处女作。“五口”开放后,外国人在福州乌石山上建教堂盖洋楼,山上所有名胜仙境,几乎被洋教士占尽,尤其是那些高耸入云的教堂建筑,如同一片乌云笼罩全城,令官民士绅惊恐不安,久而久之,因恐生愤。光绪四年(1878年)6月,英国传教士胡约翰在擅自毁掉平房改建洋楼,同时大肆侵占公地施工,加盖房屋。清地方政府会同英国领事馆翻译官、教士一起履地勘察房屋,确认新起造的房屋实为侵占公地。胡约翰无言以对,竟对围攻群众粗暴无礼,将其驱赶出院并开口谩骂,群情怒不可遏,摧毁胡约翰强占的部分房屋,放火烧掉堆积的门窗材料,火势延及两间新屋,酿成了乌石山教案。乌石山教案的案情本身并不复杂,只因教会违约、教士态度蛮横,致

使问题延宕不决。总理衙门于1879年指令曾纪泽向英国政府通报教案实情,设法说服其外交部协助了结。曾纪泽认为教案屡抑屡兴的因素很多,关键的症结在于:“由于教士的无忌惮,教士的无忌惮,由于屡得志。”^{④② p.165}。每次发生教案,中国总是抑民媚外,既惩“罪犯”又赔巨款,必然助长了教士骄横跋扈的气势。

对于如何处理教案,曾纪泽提议中国应仿照西洋各国的惯例,改变治罪、赔偿两端并举的办法,二者取其一,今后再遇民教纠纷事件“亦不得再议赔偿。”^{④③ p.165}。正是基于这种想法,曾纪泽在交涉时摆事实讲道理,最终说服英国外交部官员,同意对簿公堂,最后胡约翰败诉。创造条件利用国际惯例,解决中外纠纷借以保护自己,曾纪泽对乌石山教案的处理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在和英国签订《烟台条约》的过程,曾纪泽不失时机地运用了国际法。1876年中英两国为解决“马嘉里案”,订立了《烟台条约》。约中一项遗留未结的条款,即鸦片税厘并征的问题,几经交涉,也没有一个达成协议,最终由曾纪泽直接与英国政府洽商,圆满达成协议。在与英国政府洽商的过程中,曾纪泽说:“因思西洋各国,无论大小、强弱,其源于税项之致,皆由主人自定,颁示海关,一律遵照办理,客虽强而大,不能侵夺主国自主之权。……加税之权,操之在我,因可不问公使不问外部。”^{④④ p.331}对于收回权利问题,曾纪泽看法是:“宜从弱小之国办起,年年有修约之国,即年年有更正之条,至英、德、法、俄大国修约之年,彼亦迫于讼论,不能夺我自主之权利,则中国收回权利而不著痕迹矣。”^{④⑤ p.331}依据国际惯例,缴纳入境商品的进口税,是主权国家应有的权利,凡是非民生必不可少的物品,都是成倍征税。鸦片属于害人之物,中国重征税收本属名正言顺,这同英国重征烟酒税的道理是一致的。曾纪泽运用国际法的知识驳斥了英国政府的无理要求,在理论上掌握谈判的主动权,为协议的圆满达成奠定了基础。

解决了乌石山教案和促成《烟台条约》的签订,曾纪泽在国际外交界初露头角,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国际法意识并初步具备了独立处理外交事务的才能。然而,对国际法以及个人才艺的全面考验当数中俄伊犁交涉,曾纪泽知道自己将扮演一个据理力争、维护国家利益,同时又要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的角色,其艰难和凶险也在所难免。

1871年至1881年,中俄两国围绕着伊犁问题

进行交涉,是近代中俄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1878年,以左宗棠为统帅的西征军收复了新疆南北两路,沙俄继续霸占伊犁的借口已不复存在,可是俄方拒绝履行自己的诺言。清政府于1878年6月派吏部侍郎崇厚为全权大臣出使俄国,与沙皇政府直接交涉,由于崇厚的轻率无知,没有制定相宜的谈判原则和提出确实可行的交涉方案,终在沙俄代表的软硬兼施、威胁愚弄之下,于1879年擅自签订了《中俄交收伊犁条约》,该条约使中国丧失了大量领土和主权,并偿付巨额赔款,却只换回一座险要尽失、四面被围的伊犁孤城。

消息传回国内,朝野一片哗然,都认为崇厚丧权过多,难以接受。清政府也宣布不批准该条约,并于1880年2月任命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兼任驻俄公使,与俄国重开谈判。曾纪泽深知此番使命的艰难,他认为:“民间户婚田地,市肆贸易,立一合同,写一卷据,犹须令受损者先行画押允许,乃可成事,况两国立一条约岂可冒昧从事,专顾一边?……一旦将已押未行之约废而不用,重新商议,渠若允我,辱孰甚焉,此大难处之一端也。”^{②①(p.170)}重开谈判谈何容易,首先是如何打开僵局创造出一个和谈的气氛。最初,曾纪泽顾虑俄国不肯怡然顺从废除条约,因此,奏请总理衙门,试图采纳欧洲先例,请第三国公议评断中俄伊犁争执。曾纪泽认为中国可以主动发出邀请,请与双方不存在任何利害关系的西洋小国如瑞士等国,依据国际法,聘请著名律师,为中俄两国评断是非曲直,费用由中俄两国共同承担。他预料俄国不敢不从,也得到其他国家的赞同。“凡两国争论,各不相下,西洋有另请一国之君延请状师援据公法,从中评断者。”^{②②(p.181)}但是总理衙门并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主要顾虑到西欧的律师不一定可靠,另外改约之举如此重大,俄国自恃强硬,不是凭公断律师一句话所能折服的。曾纪泽奉旨到达俄国后,受到俄国处处刁难,因他是二等公使,而非头等,加之称全权,俄方布策等人有意刁难说:“头等所定,岂二等所能改之?”^{②③(p.51)}又谓:“全权者所定尚不可行,岂无全权所能改转行乎?”^{②④(p.51)}曾纪泽依据自己的公法知识,义正词严地驳斥道:“西洋公法凡奉派之公使无论头等二等,虽皆称全权字样,至于遇事请旨,不敢擅专,则无论何等莫不皆然。前大臣崇厚误以师心自用,

违旨擅行为便宜行事之权。盖考之中国宪章,各国之成例无一而合者也。……按之万国公法,使臣议约从无不俟本国君主谕旨,不与外部意见相合而敢擅行画押者。”^{②⑤(p.51)}曾纪泽有理有据的回答掷地响声,俄方不得不改变态度坐下来谈判。在后来的谈判期间,曾纪泽亦不时运用国际法对俄方无理要求进行辩驳,如他驳斥热梅尼要中国赔偿军费1200万,不仅名不正言不顺,而且不合国际通例时,举了欧洲几国联合实行武力威胁,迫使土耳其履行条约,不索取兵费为例:“前土耳其违约,不将都尔西纽交割蒙地利哥国,西洋各大国合派兵舰至土国海口,请问各国亦向土国索赔军费乎?”^{②⑥(p.139)}

三、对曾纪泽国际法运用的评价

曾纪泽奉行自主外交,处处维护国家的最高权力,时时把主权放在第一位。他的目光不仅仅局限于每个具体交涉事件,而且千方百计地思考运筹如何改变半殖民地的不平等地位,积极主动地争取与西方大国平起平坐,并驾齐驱,平等协商,消除分歧,参加处理国际事务地权利。薛福成评价说:“出洋星使究以曾惠敏公为第一。”^{②⑦(p.825)},更有一位美国人称赞他是“中国近代派遣外国的最成功的一个外交家。”^{②⑧(p.373)}。法国驻华代办曾大声狂叫:“谁使中国了解我们欧洲的国际法,杀死他,绞死他,他将给我们带来无穷的麻烦。”^{②⑨}但曾纪泽并没有迷信国际法,他也看到了国际法的弊端。他认为:“至于万国公法,西人未必尽遵,然大小相维,强弱相系,诚能遵守可以保世滋人,谋国家省所宜宝贵也。”^{②⑩(p.344)}可见,如果国家的强弱过分悬殊,而一味奢谈国际法是徒劳无益的。他更清醒地认识到在弱肉强食的世界格局面前,“弱国恃以自保,而强国时时焉。”^{②⑪(p.181)}。办外交要经权互用,理势并审;“言论而不论权,论理而不论势。”^{②⑫(p.29)}不会是一个好的外交官。不可否认,由于多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曾纪泽对国际法的认识和运用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缺陷,如对待不平等条约,曾纪泽虽然觉察到了其对中国主权的危害,并且提出了一些修改不平等条约的积极建议,但是他只是主张通过谈判方式逐步修改不平等条约,并没有呼吁依据国际法逐步废除不平等条约。

(下转第33页)

参考文献：

[1] 公培华. 罚金刑易科之我见[J]. 中外法学 ,1996 (5) 68 – 74.
[2] 马登民, 徐安住. 财产刑研究[M]. 北京 :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9.
[3] 林山田. 刑罚学[M].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3.
[4] 贝卡利亚. 论犯罪与刑罚[M]. 黄风译.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
[5] 林纪东. 刑事政策学[M]. 台北 :国立编译馆 ,1969.
[6] 翁国梁. 中国刑法总论[M]. 台北 :正中书局 ,1970.
[7] 高仰止. 刑法总则之理论与实用[M]. 台北 :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86.
[8] 李贵方. 罚金易科自由刑比较研究[J]. 中国法学 ,1992 (3) 80 – 83.

On Criminal Fine Exchanging Institution

ZHANG Fang – ying
(Law School Wuhan University , Hubei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Criminal fine exchanging institution is a vicarious system when criminal fine can not be carried out. Though there are some drawbacks , as a substituting measure , criminal fine exchanging institution is very essential to solve the difficult problem in carrying out fine. Because penalty has determinacy , and there is certain substituting relation between fine and punishment against freedom , in order to reduce its drawbacks and exploit its talents , we should define the nature of criminal fine exchanging institution , establish the scientific exchanging system , set up and improve the relative supplementary measure at the same time.

Keywords :criminal fine ; criminal fine exchange ; implementation

(上接第 28 页)

参考文献：

[1] 周洪钧. 国际法[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2] 曾纪泽. 曾纪泽遗集[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3.
[3] 曾纪泽. 出使英法俄国日记[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5.
[4] 张立真. 曾纪泽本传[M]. 沈阳 :辽宁古籍出版社 ,1997.
[5] 薛福成. 出使英法比四国日记[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5.
[6] (美) 马士.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M]. 北京 :三联书店 ,1957.
[7] 夏泉. 试论晚清早期驻外公使的国际法意识[J]. 江西社会科学 ,1998(10) 21 – 25.

On ZengJi – ze ’ s Understanding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its Application

ZHAO Jie – hong
(Changshu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partment of Administration , Jiangsu Changshu 215500 ,China)

Abstract ZENGJi – ze , a member of early ambassadors of late Qing dynasty , had rich knowledge of international law. He attempted to utilize the International Law to negotiate foreign affairs with the Western Countries and brought about a few positive affects and also upheld national rights and interests , which in essence could not change the small and weak status of Qing dynasty in foreign affairs.

Keywords : ZENGJi – ze ; International Law ; understanding ; application